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6.2.011

马霞、李荣林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南双向投资，《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第93-99页。

MA Xia, LI Rongl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wo-way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rn Nations”, *Pacific Journal*, Vol. 24, No. 2, 2016, pp. 93-99.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南双向投资

马霞¹ 李荣林¹

(1.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投资模式,是新时期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不单是鼓励走出去,同时也是引进来的重要时机,“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南双向投资的新增长点,对中国产业升级有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间双向投资的趋势、原因及特点,发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向投资仍处于中级不平衡的阶段,潜力巨大。从中南双向投资合作的角度,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相关对策:鼓励中国沿海地区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时机,加快产业转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时鼓励沿线转型经济体和东南亚国家利用地缘优势和比较优势对中国中西部加大投资力度。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发展中国家; 双向投资

中图分类号: F114.43/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6)02-0093-07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来,该倡议作为新时期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接受和欢迎。随着2014年丝路基金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约,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投资领域与世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紧密,而“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多是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与他们具有广阔的互利合作空间。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投资关系对新时期南南合

作及“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以下简称中南双向投资)是指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一种现象^①。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实际投资金额为16.8亿美元,新增外资企业为457家,同比增长了18.4%;其中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的实际投资额整体增长超过1倍,中东欧、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金额增长超过4倍。同时,中国对“一带

收稿日期:2015-04-10; 修订日期:2015-12-23。

作者简介: 马霞(1987—),女,山东聊城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国际贸易;李荣林(1957—),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南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

^① 王优玲、于佳欣 “双向投资新常态亮眼开放型经济”,《国际商报》,2015年1月7日,第7版。

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第一季度增长迅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25.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9%,新加坡、印尼和老挝居前三位。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南双向投资的促进效果明显,二者联系紧密。

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新趋势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对全球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逐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全球视角优化资源配置,成为潜力巨大的投资来源地。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下简称UNCTAD)的统计,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总流入量在2001年到2007年间增长迅速,但是在2008—2009年经历大幅下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2010年开始全球对外投资流出量出现小幅变暖迹象,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约5%(见表1)。由于全球经济恢复缓慢,2012年世界FDI总流入量又下降了约21%。总体看来全球FDI近年来波动较大,并且增长受到限制。与总体趋势不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却不断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于发展中国家及转型期经济体强劲的内部需求和区域内南南投资的发展,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严重的2008年仍然强劲增长,2009年才出现了暂时性下降。2010年发展中国家及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达到了世界FDI总量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发达国家。

从流出量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2002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出量仅为487.72亿美元,发达国家高达4793.41亿美元,约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10倍。然而到2013年,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增至5532.42亿美元,发达国家为8575.68亿美元,只是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的1.56倍(见表2)。

表1 2001—2013年世界及各经济体的FDI流入量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发展中国家	转型经济体	发达国家	世界总流入量
2001	226 164	8 198	603 386	837 748
2002	172 323	10 189	446 248	628 760
2003	197 459	18 037	388 807	604 303
2004	284 619	29 158	423 905	737 682
2005	341 428	32 414	622 872	996 714
2006	432 869	60 463	988 229	1 481 561
2007	591 161	88 031	1 322 795	2 001 987
2008	668 758	117 692	1 032 385	1 818 835
2009	532 580	70 664	618 596	1 221 840
2010	648 208	70 573	703 474	1 422 255
2011	724 840	94 836	880 406	1 700 082
2012	729 449	84 159	516 664	1 330 272
2013	778 372	107 967	565 626	1 451 965

(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

表2 2001—2013年世界及各经济体的FDI流出量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发展中国家	转型经济体	发达国家	世界总流出量
2001	91 758	2 554	664 506	758 818
2002	44 674	4 098	479 341	528 112
2003	51 771	10 683	518 241	580 695
2004	113 559	13 781	792 425	919 765
2005	141 041	19 754	743 475	904 270
2006	242 531	31 638	1 151 147	1 425 316
2007	327 091	50 992	1 889 074	2 267 157
2008	338 354	61 655	1 599 317	1 999 326
2009	276 664	48 270	846 305	1 171 240
2010	420 919	57 891	988 769	1 467 580
2011	422 582	73 380	1 215 690	1 711 652
2012	440 164	53 799	852 708	1 346 671
2013	454 067	99 175	857 568	1 410 810

(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

通过以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①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潜力巨大,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注重对外直接投资,新南南投资模式正在迅速兴起^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① UNCTAD把转型经济体单独列出,但由于转型经济体大多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分析时本文将其归于发展中国家。

② 李辉、张荣“中国双向投资问题研究”,《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111页。

国家,研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间的双向投资,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现实意义。

二、中南双向投资趋势与特点

本文以联合国贸发会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为基础(不包括亚洲四小龙),考察中南双向投资的情况,以便展现中南投资的全貌。

从图1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呈现赶超发展中国家对华投资的趋势。从2001年到2008年,发展中国家对华投资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并且高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2009年开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这种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总结如下:第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有严格的生产成本控制;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外企竞争异常激烈^①;第三,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更为谨慎。与此相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尤其从2003年开始总体增长强劲。在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首次超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并且从此中南双向投资差距逐渐拉大。这与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在当前中国产能过剩,迫切需要通过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优势。所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投资差距的存在基本符合中南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南双向投资是新时期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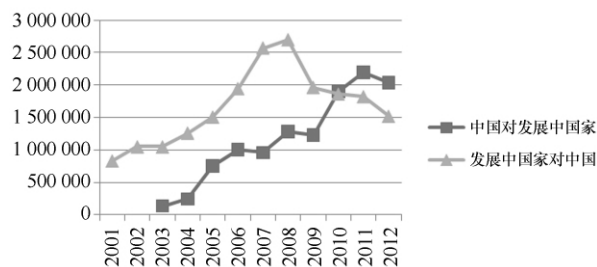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投资(单位: 万美元)

(数据来源: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数据整理得到。)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向投资

3.1 转型经济体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分类,转型经济体国家有18个,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黑、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黑山、摩尔多瓦、俄罗斯、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马其顿、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转型经济体国家分布在中亚、西亚及中东欧部分地区,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同时大多数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由图2可以看到,虽然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但是对中国的投资却一直处于疲软状态,其原因有:一方面,长久以来,转型经济体与欧洲、中亚、西亚之间的经贸来往较多,与中国较少;另一方面,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转型经济体对中国的投资信息不了解,较少地投资于中国。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日益增加,但其中波动也较大。在中国大力鼓励“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在2012年突飞猛进超过40亿美元。在未来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与转型经济体之间的投资打造一个更好的平台,中国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同时,由于信息便利化和经贸往来的增多,转型经济体将会更加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预计转型经济体对中国的投资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而有所增加^③。

俄罗斯是转型经济体中最大的国家,与中国经贸来往密切。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中俄两国投资合作已经显著加快,2012年中国对俄

^① 梁军、谢康“中国双向投资的结构:阶段检验和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3页。

^② 庞东梅“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更趋平衡”,《金融时报》,2014年1月17日,第2版。

^③ 栾国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猛增”,《国际商报》,2015年4月29日,第3版。

投资达到6.5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累计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俄罗斯,中国企业正着眼于当地快速发展的领域,如汽车、银行和电信等。然而2004年以来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11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只有0.31亿美元,累计不到10亿美元,投资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贸易,“一带一路”有可能扭转这一局面,促进中俄投资平衡化与合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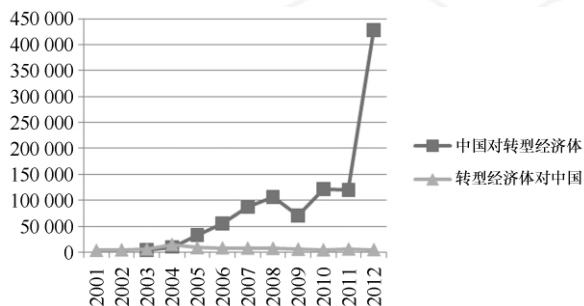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与转型经济体的双向投资^①(单位: 万美元)

(数据来源: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数据整理得到。)

3.2 东盟

由图3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发展迟缓;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保持在30亿美元上下。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的实施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的建立,从2006年开始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显著增长,并且投资差额越来越小。未来几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有望超越东盟对中国的投资。CAFTA属于典型的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区域内自由贸易和投资可以降低内部企业的生产成本,保障各项程序顺利实现,所以投资往往会从区域外国家转移到区域内国家,CAFTA在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显著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东盟国家劳动力储备丰富并且成本低廉,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国内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②。近年来,我国国内制造业表现出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产品滞销等负面现象,中国的部分制造业迫切需要对外转移,而东盟与中国在国际分工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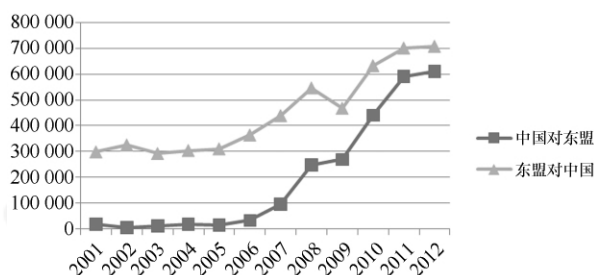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单位: 万美元)

(数据来源: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数据整理得到。)

以避免国际市场上常见的不良竞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东盟十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作为一个整体,有着统一的政策和战略目标,在对外事务中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并不一致^③。所以,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

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主要承接中国的学习型投资。学习型投资主要是指一批中国知名企业为了获得新加坡先进的技术和资源而进行的投资,如中国TCL、华为、华旗资讯、北大方正等都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投资领域也非常广泛,有贸易、运输、工程承包等传统领域,同时也延伸到了生物制药、金融、石油化工、电器等高科技产业领域。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中国较为相近,在产业上与中国既具有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双方产业上的这种特点也为中国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提供了广泛的领域。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包括服务贸易业、资源开发业、信息产业等行业;对泰国投资分布于橡胶制品、食品加工、银行、保险、化工制造、酒店、房地产等。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收入水平较低,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因此,中国对其投资的领域大多是农业和原材料相关产业。印度尼

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才开始统计。

② 郑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89页。

③ 肖莹莹“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千亿美元中国投资占比扩大”,《中国日报》,2013年2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2-07/content_8238904.html。

西亚和菲律宾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是近年来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其盈余资本相对较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显著。中国仍然需要重视东盟各国企业对华投资。东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且以中小企业占较高比例,中国应该特别鼓励其到中西部投资,推动中国中西部经济建设。从双向投资背景来看,中国东盟的合作前景尚好,加强投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3.3 南亚五国

由于投资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5个国家代表南亚作为双向投资的分析对象。

如图4所示,中国与南亚五国双向投资波动较大。南亚五国对中国的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是低水平缓慢增长,但不能忽视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对中国的投资能力。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波动很大,2006年以前中国对南亚的投资甚至低于南亚对中国的投资,并且在2006年为负值,这说明当年存在大量撤资行为。到2007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猛增至历史最高水平,但是2008年和2009年又俯冲式下降,2010年和2011年逐渐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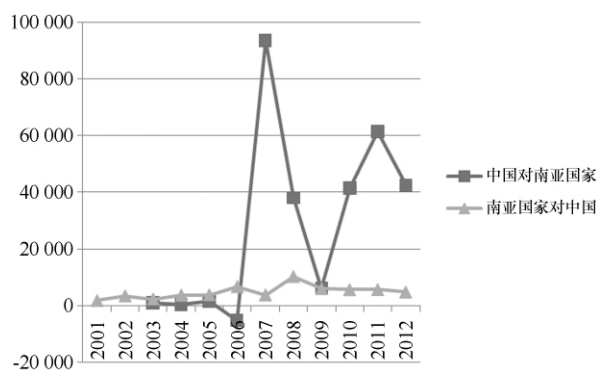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双向投资(单位: 万美元)

(数据来源: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数据整理得到。)

印度是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同时是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印度长期以来对待外资比较谨慎,限制较多。在印度,中国企业倾向于对中小企业进行收购,收购的印度资产主要是

消费与运输行业及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的公司。“一带一路”将促进印度进一步放宽和完善外资政策,放宽基建领域的外资限制,弥补其在基础设施方面长期存在的滞后问题,为中印双向投资打开广阔空间。随着印度外资限制的放宽,中国不仅投资于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也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大对IT服务、农业、制药业的投资。

印度长期以来对中国投资很少。中印作为两大新兴经济体,投资合作必不可少。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本国经济快速发展,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存在较多不足,特别是软件开发、服务外包等行业,需要加强对印度的引资力度。随着印度对外商投资限制的放宽,未来中印合作领域将不仅仅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未来印度很可能在农业、制药、信息技术服务和农产品等方面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3.4 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

蒙古国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邻国,中蒙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非常广泛。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对蒙投资的第一大国。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与中国开展投资合作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一带一路”正好可以弥补蒙古国在开采矿物资源中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埃及与欧洲隔海相望,地跨亚洲与非洲,影响力较大,并且在阿拉伯世界拥有特殊的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覆盖的重要国家。在埃及,采矿、纺织、皮革产品等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是中国企业感兴趣并且具备专业技能优势的领域。埃及自2004年起,大力实施私有化改革,推动工业现代化,目前各行各业都具有投资潜力。对中国企业来说,电信、石油、旅游、纺织等领域具有较大的投资潜力。中国与埃及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在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埃及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支持,表示将竭尽所能与中国一道推动倡议的实施,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

力量。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埃在各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若能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互之间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有利于打造更多优势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①。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认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自由化的范围和领域都在日趋扩大,外资立法普遍朝着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未来将加强相关贸易、投资政策和商业机会的信息交流,建立贸易和投资信息共享网站,扩大在展览会、博览会等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方面的合作。目前发达国家仍面临“尾部风险”,除了欧洲仍深陷债务危机,美国就业问题也依然悬而未决。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更需“抱团取暖”,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南南合作。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中南双向投资仍处于不平衡阶段;在投资分布上与众多发展中国家联系紧密,地理优势与文化特征成为中南双向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相对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模式已经走在了前列,但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对华投资规模,高质量的引资战略与大规模的走出去战略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的重要特征。与发展中国家互学互鉴,开拓创新,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有深远的意义。结合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中南双向投资问题上,中国更应该注重结构调整。对部分具有较高收入的国家,中国仍然要坚持引进优质外资,尤其应该鼓励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充分利用国际化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向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学习双向投资经验,比如东盟国家,争取少走弯路,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更好

更快地与国际化投资模式接轨。对数目众多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由于其优势产业并不多,许多产业也处于发展初期,存在大量投资机会,具有很大开发空间,所以中国要做好产业转移的准备,鼓励对外投资,这是中国资本实现“走出去”的重要内容^②。

第二,我国的未来发展之路是促进外资转型升级,加快对外投资力度,实现技术创新。为此,中南双向投资的方向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由同质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不断开拓创新的投资模式,共同培育国际投资合作新高地^③。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对外产业转移,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应该抓住时机“走出去”。比如,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导致相对过剩但技术水平不低的产业。同时,“走出去”和“引进来”应有机结合,“一带一路”的机遇绝不是单向的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过程^④。中西部省份还有很多欠发达地区缺乏外商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通道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某些通道上特定位置的区域都会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地企业可能会一哄而上,在对对方了解不清楚、不深入的情况下,利益共同点找得不是那么恰当,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一带一路”涉及到很多国家,需要双方或者多方共同协商,首先深入了解对方,和对方进行全面沟通,不要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要把目光放到二三十年后。^{*}

编辑 肖琳 邓文科

① 肖艳《中国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新战略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68页。

② 卢进勇、李秀娥“中国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特点、作用及建议”,《亚太经济》,2013年第1期,第99页。

③ 徐清、冼国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我国双向投资的性质和协调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第81页。

④ 李伯牙“‘一带一路’不是单向的‘走出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23日,第7版。

* 感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2011项目对本研究的资助。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wo-way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rn Nations

MA Xia¹ LI Ronglin¹

(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investment pattern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the new perio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n encouragement to OFDI, but also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FD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China’s two-way investment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rend,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way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found that the two-way investment is still in the intermediate unbalanced phase for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but its potential is huge. By combi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wo-way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he paper giv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China should encourage companies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using the ch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of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encouraging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two-way investment